

i 华夏出版社

i 陈先奎 著



邓小平

治国论

邓小平

治
国
论

陈先奎著

：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治国论/陈先奎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7. 8

ISBN 7-5080-1360-3

I. 邓… I. 陈… III. 邓小平—行政管理—中国—思想
评论 N. 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7117 号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4.25 印张 310 千字 2 插页

199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8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1997年,在香港回归的“7月1日”这一天,中国,中国人民以至每一个炎黄子孙那一张张因自豪、喜悦而容光焕发的笑脸,一下子成为世界各国新闻媒体跨世纪长镜头的聚焦点。中国人民,全世界炎黄子孙在欢庆香港回归之余;世界各国朝野上下,在关注香港回归中国这一极现实又极具跨世纪象征意义的伟大事件之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伟大的名字:邓小平。都会发自内心地敬佩邓小平在毛泽东之后治理中国的伟大功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严格地说,是从1978年至今,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竟把中国这样一个具有12亿人口的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治理得如此卓有成效,不能不使我们要从“邓小平是如何治理中国”的角度,重新审视我们过去对邓小平思想与实践的理解与体悟,以便更进一步地走向邓小平思想的理论思维的深处。

在治国方面,中国素有“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古训,又有“上马安邦定国,下马治国理政”之类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政治家模式,极为推崇那种“修、齐、治、平”的人生功业境界,对武功与文治具有比较鲜明的政治意识及堪称深邃的政治智慧,以

至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几乎就是各种治国思想方略的颀颀砥砺与演进。

历史证明,由武功到文治,即由广义的夺取政权到秉政治国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古今中外各类型国家政治发展、政权更替的一条规律。对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以至一位政治家来说,“打天下”夺取政权,或以其他方式把国家“名器”抓到手固固然不易,但执掌政权以后治理国家更难,考验更全面、更持久、更深刻、更严峻。

在20世纪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从列宁创立苏维埃俄国,到斯大林领导建设苏联社会主义,再到东欧、古巴和中国等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创立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臬的各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开国立国以后,同样遇到了一个应该怎样治国,由武功转入文治,由革命造反转入执政治国,谋求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课题。

列宁是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首创者和奠基者,他的治国实践,主要表现为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试图通过新经济政策,努力寻找一系列中介环节,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①列宁的思想与实践,有过战时共产主义的曲折,但是,在理论上,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是一条活泼而充满生机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上升路线;在实践上,列宁尝试的两种治国方案,是他留给后来者的宝贵遗产。

斯大林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领导前苏联共产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中文第1版第155页。

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前苏联人民要求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及前苏联所处的险恶的国际环境，在发展生产力，搞工业化、现代化问题上抓得比较紧，危机感也很强，取得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并通过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砥柱中流的决定性作用，首次在世界意义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及其道义力量。但是，从斯大林晚年破坏民主与法制的错误，从前苏联现代化发展战略强国与富民一硬一软极不相称，尤其是从僵化和高度集权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弊端来看，前苏联的治国之道不能算是成功的。更确切地说，斯大林的最大失误，与其说是他严重破坏民主与法制，和不当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不如说是他关于社会主义体制的僵化观念，及其在国内国际不允许改革的错误方针。他把前苏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模式化、教条化、凝固化、神圣化，要求人家毫无例外地照搬照抄，甚至为此不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施强制手段，只许人家照抄照搬，不许人家探索和改革，自己更不进行制度创新。他的僵化观念、体制与思想，中断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所标志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充满生机的上升路线，在前苏联国内，并以其巨大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桎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与活力。结果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以其最初的优越性，取得一系列外在成功的同时，内在的生机和活力，却在一天天可怕地萎缩，以致前苏联东欧那样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居然在几十年以后被自己内部的所谓“改革新思维”，和外部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和平演变”搞垮了。

毛泽东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者。关于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在列宁之后邓小平之前，他与南斯拉夫

的铁托一起,堪称为两位伟大的探索者。他雄才大略,志存高远。一方面,在中国革命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独立探索精神,使他能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之日起,就自觉地致力于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另一方面,他对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知之甚深,在领导新中国近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国务活动中,对新中国的治国之道费尽了心力,甚至尝试了几种不同的方案。

在建国前后,毛泽东以其“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恢宏的历史超越感,及其对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透彻了解,对由“马上打天下”,到“下马治天下”,由革命造反的不世武功,到执政治国的盛世文治的历史性转变,是有所认识、有所追求的。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与黄炎培关于天下兴亡“周期律”的讨论,与郭沫若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探讨,标志着毛泽东已将执政治国的问题,提到了自己运筹帷幄的议事日程。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谓“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①的历史性感叹,以及关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②的创世纪宣言,反映的就是毛泽东当时的政治意识与历史心境。毛泽东试图完成由“打天下”到“治天下”的历史性转变,探索新中国长治久安的立国治国之道。

为此,毛泽东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之余,上下求索,在不同程度上尝试过几种不同的立国治国方案。不同方案之间相互矛盾和冲突,浓缩了新中国近30年的治乱沧桑和毛泽东治国之道的成败得失,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一代开国元勋锐意探索的结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9—1370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9页。

晶，也表现了探索的艰难，和毛泽东个人思想的巨大张力。

概括地说，毛泽东的立国治国方案大致有三种。

一种是从建设新民主主义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立国治国方案，着眼点是开国、立国，即解决建立什么国家的问题，同时兼有治国的内容。

新民主主义的方案，形成于1935年到建国前后这段时间。基本思想是：在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中国，在全国夺取政权以后，从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需要来看，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马上搞社会主义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因此在一个长时期内，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需要尽可能利用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首先致力于经济建设，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然后再在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上，向社会主义转变，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显然，这是一个“先建设、后改造”，先发展生产力，再搞社会主义的思路。这一立国治国方案的实质，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联系，而并不过分强调政权对建立新制度，先进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反作用；在实践上，不马上消灭剥削，更不是马上消灭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而只是大致确定一个社会主义方向，并以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和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后搞起来的国营经济，作为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保证和经济基础。真正搞社会主义，只把它当作将来要办的事，至少是15、20年以后的事。诚如薄一波所说：“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曾主张建国以后继续搞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等国家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造。”

“我们党在立国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是真心诚意的。”^①为此，当时刘少奇提出过“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②的口号，周恩来、邓小平在他们起草的一个文件里，也提出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③的说法。

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比较注重恢复和发展生产，比较注重安定天下的大问题，比较注重引导、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生机勃勃，励精图治。当时党内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毅、薄一波、张闻天，党外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傅作义、黄炎培、张治中，等等，一代元勋，几代精华，群贤毕集，众星灿烂，在开国、立国、治国，执政、参政、议政诸方面，群策群力，各展雄才，齐谋大略，尤其是建国初期在经济战线上的“两大战役”，^④迅速涤荡旧社会污泥浊水的社会改革，等等，在三年不到的时间里，使苦于长期战乱的中国，迅速出现了天下大治、生机盎然的局面。真乃新中国的天是“蓝蓝的天”，新中国的人民“好喜欢”。人民的心境，则比“蓝蓝的天”还要纯净、欢畅、舒坦。这是一个“人民”范围空前宽泛，各族人民空前团结，祖国空前统一，社会空前平等，经济恢复，政治清明，令行禁止，秩序稳定，人人要求上进，社会风尚和道德水平显著提高的时期，是充满了理想和希望的开国时期。

然而，三年大治，并没有使毛泽东稍感满足。建设新民主主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页、第31页。

② 参见庞松、王东：《滑轨与嬗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

③ 孙钢：《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提出的一点考察》，《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

④ 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义的设想,虽然是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与当时被奉为正统的斯大林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实践,有很大区别,与千百万中国共产党人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赖以作为精神支柱、奋斗目标的社会主义理想,有相当差距。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都想早点搞社会主义,早点把理想变成现实。加上当时并不真正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的真实情况,所以特别相信社会主义在任何条件下,都是解放生产力的最好形式,后来甚至认为愈穷愈利于搞社会主义。于是,毛泽东开始放弃新民主主义的开国、立国、治国纲领,变立新民主主义之国,为立社会主义之国,变“先建设、后改造”,为“改造与建设”同时“并举”,实为先改造后建设的立国治国大思路。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具体道路的探索上,创造了由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同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力求保持稳定,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寻求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和生產发展之间的平衡点,等等,都有中国的特色;在政治制度方面,有一些重要的创新,如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正式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颁布了一批重要的法律法令,初步开拓了新中国的法制化道路;思想文化方面,发起了知识分子的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等等。这些都表现了毛泽东立国、治国之道的独特之处和远见卓识,显示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智慧。

问题则主要有:在目标模式即社会主义制度模式方面,基本上还是以苏联为榜样,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方面没有什么新东西,而且留下了一些新问题。一个是社会主

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但是,有没有必要使它成为唯一的经济形式?一个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对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改造的完成,而扩大到全部经济生活,市场经济还要不要?一个是公有范围是否越大越好,经营是否越集中越好,等等,这些都对以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建国、立国的任务告一段落,治国的课题开始突出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在指导思想方面,建国前七年流行过“学习苏联”的口号,随着实施“一五”计划、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及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了解的深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开始认识到:革命道路不能照搬外国,建设道路同样不能照搬外国。“学习苏联”有其收到积极效果的一面,但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成功的经验也并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探索。诚如后来毛泽东所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如此,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苏联的好的经验,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了好的作用。苏联一些不好的经验,被我们“抄”过来后,暴露了它的许多弊病,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

特别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既捅了漏子,又揭了盖子。捅了漏子,是说这个报告有严重错误,导致国际共产主义队伍思想混乱,西方乘机掀起反苏反共高潮;揭了盖子,是

说破除了对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迷信,^① 对各国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起了极大的解放思想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治国之道的任务,较快地、正式地提上了议事日程。探索中国道路的意识已相当明确,相当自觉。这一时期探索的主要成果有:《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路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比较成熟的治国方案。基本思路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为此,我们不能用压制的、专政的办法去解决,而应该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扩大民主,用民主的、说服教育为主的办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按照工农业并举、中央和地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发展我国的经济;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知识分子工作,激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力,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在 50 年至 100 年左右的时间里,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设想,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基本指导思想,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以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为方针,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民主的、安定的政治环境。这是毛泽东治国之道的最高科学成果。

另外,这一时期新中国的外交比较活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祖国统一方面,继毛泽东、周恩来在建国初期亲

①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17 页。

自决策把香港留作对资本主义交往的窗口之后,又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进行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尝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毛泽东坚持正确评价斯大林历史地位的立场,对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治国之道的高明之处。

可惜的是,由于实践的时间还很短,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许多新的观念和方针还不可能牢固地确立并取得深刻的共识,不可能形成后来那种扭住不放、“一百年不动摇”的理论自觉。1956年,即毛泽东和全党在中共八大前后的许多治国方面的新设想、新方略,还没有付诸实施,或者没有充分付诸实施,很快又发生反复,逐渐背离了上述正确的治国之道。在治国方法,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在治国目标,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问题上;在治国方式,即采用什么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一个政治思想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追求“人民公社”式的一大二公三纯,大搞群众运动,以至“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治国方案。

这一治国方法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反映到理论上,毛泽东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认为我国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但是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将是长期的,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久又进一步断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并且宣布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右

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实际上一般地被列入第二个剥削阶级的范围。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治国论”由此肇端，直至后来明确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一套“左”的阶级斗争理论，说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把阶级斗争当作了治国以至治党的不二法门。

值得注意的是，“阶级斗争治国论”滥觞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历史转变时期，尤其是产生于1957年出现少数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之际，说明治国实践中驾驭不熟悉的复杂政治局势的艰难，和实现转型期发展的不易。

一个方面，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后现代化国家发展经济，面对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压力，“速度”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此，八大的方针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力求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有一个均衡的发展格局，一个合理的发展速度，同时强调建设规模必须与国力相适应，必须兼顾生产和生活。毛泽东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曾经讲过，“速度问题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当战后五六十年代“赶超战略”在第三世界和前苏联东欧各国形成一个世界性思潮时，毛泽东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1957年9月—10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期间，他听到会上有的地方领导重提多快好省，感到很兴奋，开始批“反冒进”，提出了一个“反反冒进”的口号，并由此把经济建设引上“大跃进”的轨道，而且在党内外搞批“右”，

为“大跃进”扫清政治思想上的障碍。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批邓子恢“小脚女人”开始，到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到1958年批“反冒进”搞“三面红旗”，到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后在党内掀起更大规模、更加来势凶猛的“反右倾”，等等，一路反下来，为“大跃进”及其他形式的“左”倾开拓道路。“右倾”成了当时最大的帽子，“左”成为革命的时尚。经济建设上搞高指标、浮夸风，搞“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指望在短期内实现经济超高速增长，达到“超英赶美”的目标，完全打乱了经济建设的规律，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一个方面，是思想观念色彩特别浓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述，提出过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农业国家，但是，毛泽东的侧重点是，根据国内外有利的形势，特别是共产党执掌国家权力的条件，尽快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由于大体采取平和的途径，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又由于对私人工商业采取和平赎买政策，三大改造的某些内容对经济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援助及其他种种原因，1953—1957年的国民经济有较明显的发展，更使毛泽东确信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具有“主要的决定作用”。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更突出地强调生产关系决定性的反作用，强调超越阶段穷过渡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思想，以及夸大主观意志和精神作用的思想，并且正式提出了“政治挂帅”的口号。毛泽东强调：思想和政治工作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

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①在毛泽东的治国思维里,不是经济,更不是科技决定思想和政治,而是思想、政治去决定、主宰、领导经济、科技及其他一切,是抓政治、抓思想、抓革命,促生产、促经济及其他一切工作;不是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选择生产关系,而是要凭借先进的生产关系去发展生产力;不是以发展经济的方法解决问题,而是以政治评判裁量经济,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来解决问题。这些思想,最后被林彪、“四人帮”推向极端,变成极左的空头政治。政治也好,思想也好,都成了打人、整人的棍子,演变为封建法西斯式的“上层建筑领域全面专政论”。

治国目标模式,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人民公社模式。1958年8月,毛泽东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作了这样的解释: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同月,党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总之,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合为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方式;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城市化,城市农村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这是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平均主义、小生产、穷过渡、

^① 《工作方法(草案)》(1958年1月)。

共产风和军事共产主义等社会主义“空想论”的东西。

毛泽东的这些关于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思想,在1966年发表的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五·七指示》由军队即解放军“大学校”,讲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由农副业生产讲到办小工厂,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等,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是毛泽东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蓝图和社会发展方向,核心是要在各行各业建成逐步消灭社会分工,逐步消灭商品,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实行平均主义的全面发展的小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理想的社会主义大社会。“文化大革命”10年间,“五·七道路”风行全国,“五·七”工厂、“五·七”农场、“五·七”学校、“五·七”干校、“五·七”医院等等,即使并没有贴“五·七”标签的单位,也在走“五·七”道路。“五·七指示”一时成了治国、治党、治军、治民的“纲”中之纲。

在治国方式上,晚年毛泽东主张的是一种“运动治国论”。最早是在反右斗争扩大化中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认为这种以“四大”为内容的“大民主”,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后来在“大跃进”中,又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搞经济建设,认为搞建设应当轰轰烈烈,用群众运动和“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可以实现短期内的经济超高速增长,可以做到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做不到的事,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解决中国“一穷二白”的问题,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中国。1958年毛泽东批“反冒进”,一条罪状就是认为“反冒进”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搞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将群众运动的治国方式概括为:全党动手,书记挂帅;全民大办,群众运动。其中“书记挂帅”一条,又从上到下强化了党政不